

# 中国百年教育现代化演进的线索与命题

邬志辉\*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自近代以来中国百余年的教育现代化探索,基本上是在政治动荡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演进无法遵循教育内在的发展逻辑与连续性,而表现为与政治的同步性。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线索与命题先后经历了超越传统教育、教育西化、教育中国化和教育现代化的演进。

**关键词:** 中国教育现代化; 历史演进; 线索与命题

**中图分类号:** G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02) 04-0045-05

中国教育现代化从何时开始,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争论的焦点是,究竟应该以外在的政治性事件为基准还是以内在的连续性逻辑为准绳来划分历史。囿于政治性标准的表层分析所造成的历史大断层,史学界日渐倾向于从历史的内在连续性去发掘教育演进的线索与命题。研究范式的转换无疑会促进新思想观点的产生,但却不一定能完整地逼近历史。近代中国的教育现代化行程,基本上是在政治动荡的背景下进行的,而且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动荡。因此,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连续性是在表面动荡之背景下隐现的。本文即从表层的政治性事件入手,寻求百余年来中国教育现代化内在连续的历史线索与命题。

## 一、对传统教育的三次超越

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不仅打破了古老“天朝帝国”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还暴露了以造官吏(统治者)和制顺民(被统治者)为目的的封建传统教育的弊端。由此,中国便在其后近80年的时间里(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渐次进行了三次学习西方、超越传统的教育现代化运动。这三次超越与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对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经历的分期是一致的,即由表层逐渐向深层深化、拓展。“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

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从甲午战败中,认识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制度不良”,于是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因为从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政治制度变化很大,但文化上仍是老一套,以致于革命的希望“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sup>[1]</sup>。

### (一) 对传统教育的第一次超越

这次超越发生于鸦片战争(1840年)之后的50年间,西学先从器物层面打破儒学教育的独尊局面。教育现代化意识萌芽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形成的“经世致用”教育思潮。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洞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使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动荡和大转变之中。地主阶级改革派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挽救清朝之衰世,抵抗外侮,改革社会,针对传统教育空疏腐朽之弊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教育改革主张,虽然这次教育改革在“师夷”(学习西方)的目的上是为了“制夷”(抵御西方),以保卫封建专制王朝,在“师夷”内容上仍局限于西方军事、科技和地理等器物层面的“长技”上,体现了消极防卫的性质。但是,它毕竟唤起了南宋事功学派和明清之实学教育思潮中儒家文化教育“经世

\* 收稿日期: 2002-01-04

作者简介: 邬志辉(1966—),男,黑龙江鸡东县人,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教育现代化和教育政策。

致用”精神的复兴。更重要的,它把儒家封闭的传统教育体系撕开了一条裂缝,第一次使传统文化教育渗入了异质文化教育的内容,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先声。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教育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超越。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进一步系统地完善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教育方针。洋务派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洋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他们恪守本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即伦理和政治教育,只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实业教育。张之洞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sup>[2]</sup>。由于固守中学,洋务派所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诸如聘请洋人为师、创设新式学堂、派遣学生留学、开设西用课程等等,均没有收到明显的实效。以1872年清政府派遣第一批留学生为例,清政府为使他们不忘记祖国文化和儒家经史之学,专门安排了《孝经》《五经》等传统儒学课程。他们很少有机会审视西洋人教育和生活的真精神,后来又被中途遣送回国。

尽管如此,“中体西用”的基本精神中毕竟包含了用西学来补中学之不足的因素,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中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物质的技术教育是精神的道德教育所不能替代的新事物。洋务派在器物层面提出的“西用”内容远远超出了魏源“长技”(军事技术)的范围,拓展到了西政(“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这里的西政指的是行政措施,而不是西方政治制度)、西艺(“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和西史等方面。它冲破了两千年来传统儒学只讲“中学”的樊篱,使传统教育在真正意义上向现代化教育迈出了第一步。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是在外力逼迫下的一种防卫性的教育现代化,但在某种意义上它实际已成为中国人对教育现代化的一种自觉欲求。

## (二) 对传统教育的第二次超越

这次超越发生于中日甲午海战(1894年)失败后的20年间,西学又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攻破儒学教育的传统壁垒。以“御夷”和“自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派教育改革的种种努力与“实绩”;随着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而失败了。为什么几十年苦心经营的“长技”、“西用”却被东邻小国日本打败?康

有为认为,洋务派的“自强新政”只是“变事而已,非变法也”。梁启超也指出“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己矣”<sup>[3]</sup>。因此梁启超一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口号,提出“政学为主义,艺学为附庸”的新主张。维新派倡导伸民权、抑君权,废科举、兴学校,实行君主立宪制和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教育制度。在维新派教育思想的指导下,不仅把对西学的学习由洋务派的“科技教育”拓展到“政治教育”;更为重要的是看到并改革了封建教育制度的弊端。康有为认为,“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人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sup>[4]</sup>。“然而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sup>[5]</sup>维新派的教育改革经历了一个渐变深化的过程,由《四书》《五经》内容到各类“艺学科”,由八股试帖到策论,由缩减科举取士名额到停止科举,从近代第一个较完备的法定学校系统(即“壬寅学制”,1902)的出台到“癸卯学制”(1903)的实施,从为封建政体服务的“壬寅·癸卯学制”再到为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服务的“壬子·癸丑学制”(1912—1913),以及倡导男女平权和民主平等教育等等。这一切无不说明维新派对传统教育的超越已由器物层面提升到了政治制度层面,它对传统教育的冲击已远远超过上一次的超越。

维新派认为教育改革是政治改善的基础,因此严复明确提出“是以今日之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的教育改革主张。认为实行君主立宪制必须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前提,“学校未成,知识未开,速兴议会者,取乱之道。”而以孙中山、章太炎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在对待教育与革命的关系上,主张先革命,推翻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然后再发展教育。孙中山指出,教育“固是改造中国的要件,但还不能认为第一步的方法。第一步的方法……只有革命”<sup>[6]</sup>。革命派并不反对“开民智”,但要求“开民智”必须服务于革命的目标。

尽管维新派和革命派对传统教育的超越比洋务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他们仍然固守着封建专制政体赖以生存和维系的精神资源——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奉行“托古改制”政策,以致于在废科举(1905)的两年后,还有人向皇上递呈,请求“变通

学务, 科举与科学并行, 中学与西才分造”。科举制度废除后, “新读书人”取得的依然是“举人”、“进士”之类的旧功名, 归国留学生也不得不归靠到“功名”之下。教育现代化进程在传统的惯性阻力下步履维艰。

### (三) 对传统教育的第三次超越

这次超越发生于《青年杂志》创刊(1915)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 西学从文化精神层面上全面、彻底地摧毁了儒家文化教育传统。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不彻底性, 虽然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 但暗中却潜伏着复古主义的教育逆流, “尊孔读经”的浊浪汹涌。袁世凯称帝宣告辛亥革命失败。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 以“民主与科学”为口号, 对传统教育进行了全面、彻底的反思和批判。陈独秀宣称,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 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sup>[7]</sup>。因为“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 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 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 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 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 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sup>[8]</sup>。在教育上, “西洋教育所重的是世俗日用的知识, 东方教育所重的是神圣无用的幻想; 西洋学者重在直观自然界的现象, 东方学者重在记忆先贤先圣的遗文。我们中国教育, 若真要取法西洋, 应该弃神而重人, 弃神圣的经典与幻想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sup>[9]</sup>。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去礼”“非孝”“吃人的礼教”“古书害人”“反封建主义”等口号, 以及追求的“伦理道德的彻底觉悟”和治理“国民性”等, 都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思想, 触及到了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个性自由与人性解放的倡导, 对白话文和新文学的推动, 对反抗儒家道德教育、改变中国古书“页页有毒”的局面, 实施全面的普及性和个性化教育所起的作用, 功不可灭。但是, 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追求对“伦理道德的彻底觉悟”和向“西方文化的充分学习”, 几乎使传统的文化教育体系面临崩溃和解体的边缘, 助长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情绪。但无论怎么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教育现代化的一次可贵探索, 它所获得的思想解放堪称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这正如罗荣渠先生看到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思想空前之大变动’(孙中山), 主要并不在于已经批倒了各种旧

礼教和旧道德, 而在于破除对自由探索的各种桎梏, 形成一个各种新思潮百家争鸣的局面”<sup>[10]</sup>。

## 二、从教育西化到教育中国化 再到教育现代化

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对传统教育的超越过程, 实质上是教育西化的过程。无论是洋务教育、维新教育还是新文化的欧化教育都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教育模式为参照系的, “五四”运动使教育的西化达到了顶峰。然而,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污, 使国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产生了信仰危机。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著作中表达了中西文明互补, 甚至以中补西的心声: “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 第一步, 要人人有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 第二步, 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 得他的真相; 第三步, 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 还拿别人的补助他, 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 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 第四步, 把这个系统往外扩充, 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sup>[11]</sup>在这样一种心态下, 一些人喊出了教育要“中国化”“农村化”等等口号。《独立评论》第11号登载了邱椿和孟真先生关于教育崩溃责任问题讨论的一则通讯, 其中说: “中国新的教育, 最初抄袭日本……后来模仿法国……近三四年, 他们都觉悟纯粹抄袭的错误, 而提倡中国化教育。关于这类文字, 已发表了好多, 差不多成为滥调了”<sup>[12]</sup>。

针对“新教育中国化”有复返旧教育、开历史倒车的危险, 陈序经指出不能以不合中国的国情为借口去反对西洋传进来的现代新教育, 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概念。他说: “我们的见解是: 全部的中国文化是要彻底的现代化的, 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 是要现代化, 而且要彻底的现代化。职业教育固是要如此, 普通教育也是要如此。低级教育固是要如此, 高等教育也是要如此。城市教育固是要如此, 农村教育也是要如此。惟有现代化的教育, 才能叫做活的教育。惟有现代化的教育, 才能叫做生的教育。惟有现代化的教育, 才能叫做新的教育。中国人而不要新生活的教育, 也算罢了, 要是要了, 那么只有赶紧的, 认真的, 彻底的现代化”<sup>[13]</sup>。特别是《申报月刊》在1933年7月(陈序经的《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一文成稿于1932年, 发表于1933年3月26日)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之后, “教育现代化”概念基本取代了“教育西化”概念。这一变化并不是什么文字游戏, 而

是有着深刻的意义。冯友兰先生说得最好,他说:“从前人常说我们要西洋化,现在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或现代化。这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彻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海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而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这一觉悟是很大底。即专就名词说,近代化或现代化之名,比西洋化之名,实亦较不含混”<sup>[14]</sup>。

从“五四”运动一直到现在,基本可用教育现代化之名来概括中国对教育的追求与探索。这一艰难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即1919年至1949年间的教育现代化多元探索阶段和1949年至今的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的探索阶段。

在建国前30年教育现代化的探索中虽然思潮叠起,但归纳起来,无非是在“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三民主义”是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革命理论,在1922年革命全面受挫后,他又重新阐释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不久,便提出了教育方针“必须以‘三民主义’之精神,融化东西文化之所长,使全国人民在‘人民之生活,社会之生存,国民之生计,群众之生命’上备具‘三民主义’之实际功用,以达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这目的”。应该说这种教育追求是进步的,特别是在孙中山“扶助农工”政策导向下,催生了乡村教育、平民教育、职业教育和生产教育,这对“五四”时期仅仅局限于思想层面的精英式教育运动无疑具有超越的意义。但遗憾的是,“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被后来的国民党政府歪曲和篡改,没有真正发挥应有作用。“五四”时期的空前思想解放和文化开放,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且使新文化运动一些主将的思想发生转变,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改革教育。针对罗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使无知的有知识,有知识的更进一层”和“开发实业救济物质生活,至于社会主义不妨迟迟”的观点,陈独秀尖锐地指出:“中国人民知识方面物质方面都这样不发达,所以有心改造中国之人都早已感觉着发展教育及工业是顶重要的事,这是不待讨论的;但是有一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义?我个人的意见,……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

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人底错路。”<sup>[15]</sup>,经过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新教育主张和恽代英、杨贤江等人的革命教育理论的发展,毛泽东确立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马克思主义还促进了其他教育思潮的演化,如平民教育演化为工人教育,勤工俭学教育演化为广大工农服务的教育。新民主主义教育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教育,转而学习俄国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模式,超越了“五四”新教育的精英性质,而转向广大的工农群众,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新民主主义教育始终与政治斗争密切配合,助长了教育的政治化倾向。也正是因为单纯的政治标准,使教育的国际交流仅限于俄国和少数国外友好人士,实际上使教育又处于半封闭的状态之中。

“1949年的确是教育现代化的一个分水岭”<sup>[16]</sup>。从此,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开始了社会主义性质教育现代化的探索,标志着中国教育现代化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半个多世纪所经历的艰辛求索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7),教育“全面苏化”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教育现状是集三种传统于一体的,即从民国时代继承下来的移植在古代儒学基础上的现代西化教育,中国共产党人在30年代和40年代领导农村边区政府的新近的经验,以及新政府雄心勃勃地向苏联学习的计划<sup>[17]</sup>。由于过分注重政治和社会制度,提出了“全心全意地”、“系统地”、“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口号,致使新中国初期的教育制度、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等全盘照搬苏联。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由于忽视与本国教育实际的结合,出现了“机械照搬”的教育主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育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

第二阶段(1958—1978),封闭探索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道路时期。1957年中苏两党关系恶化,在“反修正主义”的运动中开始全盘否定苏联教育经验,独立探索新路子。其间许多提法和做法,比如毛泽东在1964年“春节谈话”中批评“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说现行“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和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的探索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是很好的。虽然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改造教育的做法曾引起世界关注,并引出一场所谓“学习中国样板”的国际运动<sup>[18]</sup>,但“文革”的教育后果是灾难性的,造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中断(Breakdown of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第三阶段始于1979年,国家在全面恢复教育秩序之后,开始了新的开放式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的探索。应该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现代化是从这时开始的。在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教育开始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迈向现代化,走出一百年前的“教育救国”幻梦,进入今天的“科教兴国”时代。特别是在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已全面迈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的新阶段。

####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M]·岳麓书社,1985。
- [2] 张之洞著,李忠兴评注:劝学篇·循序第七[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 [3]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饮冰室合集(第一册)[M]·中华书局,1989。
- [4] 汤志钧主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M]·中华书局,1981。
- [5] 王棧主编·严复集(第一册)[M]·中华书局,1981。
- [6] 孙文著·孙中山选集(上卷)[M]·人民出版社,1966。
- [7]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J],新青年。
- [8] 陈独秀·答佩剑青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北京三联书店,1984。
- [9] 陈独秀·近代西洋教育[J]·新青年。
- [10] 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11]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M]·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 [12] 邱椿,孟真·教育崩溃的一个责任问题[J]·独立评论。
- [13] 陈序经·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J]·独立评论。
- [14] 冯友兰·新事论·共殊,三松堂全集(第4卷)[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 [15] 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J]·新青年。
- [16]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17] [美]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18] [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下)[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 Clues and Propositions for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WU Zhi-hui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for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time has basically been taken with the background of political unrest. This particular historical background has led to the result that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has displayed its synchronism with the politics instead of following the inherent development logic and continuity of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clues and propositions of China'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have undergone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ranscending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education westernization, education localization and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hina'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historical evolution; clues and propositions